

生活教育研究资料丛书

生活教育文选

陶行知 等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生活教育研究资料丛书

生活教育文选

陶行知等著 胡晓风等编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 淳

封面设计：何 一 兵

版面设计：唐 瑛

※ 生活教育文选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剑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1988年3月第一版

印张 22 字数 506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10 册

ISBN7-5408-0375-4/G358

定价：4.84元

本丛书系由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委托四川
陶行知研究会具体筹划，并组成编辑委员会
负责编辑工作。

代 序

为了纪念生活教育运动六十周年，四川陶行知研究会、重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校史研究会编辑《生活教育文选》，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文选开头，特别选辑了陶行知的一篇文章、一个提案和一首诗，以说明生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渊源，说明陶行知对马克思主义的逐步认识过程，以及这个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这对我们研究生活教育的历史发展及其现实意义，将是十分重要的。

一篇文章

这是指1919年3月在《新教育》第一卷第2期发表的《普露士教育之基本改革》（《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05～109页）。他在这里鲜明地提出“教育与政治最有密切的关系”，“若欲明白普露士教育上的改革，必先明白现在普国掌权的是什么人”。他热情

赞颂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五六十年来的巨大成绩，即“社会民主党就一跃而为全国政治的中枢”。他介绍了当时德国在教育上所进行的六个方面的改革，其中特别介绍课程改革的三项主张：第一是关于德育，主张宗教和教育分立；第二是关于体育，主张一律废除兵操；第三是关于社会主义，主张在大学设社会主义一科，以资研究。他赞颂德国把“最重军国民主义的阶级制度的学校，一变为平民的共和的学校，岂不是世界的一个大大的幸福么？”他殷切希望“培植那平民主义的教育，使他能够开花结果，为东亚放一异彩。”

这篇文章最能代表陶行知1917~1926年这一时期的思想。也最能说明陶行知在这一阶段正从自由民主主义者向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这种转变有以下四个突出的标志。

一、他留学回国后致力于西方教育学说的介绍时，特别着力于介绍德国。他最初写的一些文章几乎都涉及到德国。他多次指出：“十九世纪以前，德人师天下；十九世纪以后，天下师德人。”“此后言教育者多宗德人”，“言科学者多宗德人”（《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61页、72页）。在这种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他介绍了当时德国的教育改革。这就证明他至迟在1919年就接触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了。他不仅涉及到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涉及到马克思领导创建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不仅涉及到政治，而且涉及到教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德奥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社会革命洪流，冲击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也鼓舞着爱国爱民正准备从事教育救国事业的陶行知。德国十一月革命从1918年11月3日基尔水兵起义开始，次年2月魏玛共和国刚刚建立，3月他就发表文章。5月，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覆

亡，革命历时半年才结束。在革命过程中，他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时介绍了德国的教育改革，这样迅速地作出反应，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在文章中介绍的某些方面还不那么正确，对政治形势的介绍还不那么全面。他没有区分马克思和拉萨尔；没有区分在马克思亲自指导下创建的社会民主党和后来分裂为左、中、右三派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指出魏玛共和国及其教育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他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因而没有能够象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那样，及时介绍正在蓬勃兴起的苏维埃运动和刚刚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尽管如此，陶行知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所作的介绍和宣传，仍然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就是陶行知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萌芽因素。这对他从事生活教育事业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是他由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向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第一个突出的标志。

二、他把教育和政治结合起来，构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创立了不同于裴斯泰洛齐和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

教育与政治本来是紧密相联的。列宁有句名言：“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列宁全集》第28卷第386页）陶行知早在1914年在国内读书时，他就写文章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他说：“教育家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他认为生计和教育是国家的两大要素，“然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渐臻满意”。（《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51页）1918年他明确提出教育救国的口号。1919年他讲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就是要用新的学理，新的方法，来改

造学生的经验。”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一方面利用自然界，一方面谋共同幸福”的能力。1923年他说：“我们办教育竟无补于国家之大局，岂不是最要令人反省的一件事？如何办理教育，使他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是我们教育界的根本问题。”（《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23页、366页）1925年，他强调“国家运用教育以达立国之目的。”（同上第55页）1916年杜威写《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是杜威教育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代表性著作，对后世的教育有很大影响，其中有专门一章讲教育的社会功能。这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正因为这样，陶行知在美国留学获伊利诺大学硕士学位后，才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承杜威。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认识到教育的伟大社会作用，这是对教育史的一个历史贡献。这个贡献是他们在不同地方，互不相识的情况下各自作出的，1915年以后他们才相互吸取对各自有益的东西。但是，他们对教育目的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陶行知主张通过教育谋求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共同幸福。而杜威则主张学校是一个特殊环境，专门培养传递和保存“把现存的社会风俗纯化和理想化”的能力，培养抵制对现存社会有离心力的能力。参见（《杜威教育论著选》第150～154页）这种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和陶行知竭力改造旧社会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正因为这样，陶行知才立志献身于教育，在黑暗的探索中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理论；杜威创立了适合资本主义制度的近代教育理论。陶行知和杜威有同有异。那种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完全是从杜威那里搬过来的，并把陶行知与杜威等同起来，是没有根据的；那种认为陶行知与杜威完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对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应该具体分析，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

1、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发生力量。陶行知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走向社会立志报国的时候，往往容易从他们拥有知识优势的实际出发，选择教育这个职业，容易倾向走教育救国的道路，这是他们自身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当时的客观环境决定的。革命知识分子几乎都经历过这一步，这是历史的必然。

2、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以后，有的进而走向革命，有的走向反面，这是由于对救什么样的国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而引起的政治分化。在旧民主主义时期，陶行知追求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幻想共和制度能够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康乐的愿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追随孙中山，提出“只有真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140页）这个时候，他所要建立的国家，就是孙中山追求“唯俄国为新式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6页）以后，他奉马克思为“改造社会理想之学者”（《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119页）。

3、他的选择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陶行知对教育与政治相结合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在对待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他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后总算辩证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1926年前，总是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中心，他创立生活教育理论的时候还下定决心：“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646页）并立即付诸试验。他认定只有通过教育的途径才能达到政治的目的。在1927年～1930年，他主张教育与政治并重。他说：“政治与教育原是不能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我们是要在教育上革命，进而办一种革命的教育。”（《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17页、138页）因而在他的影响下创办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以及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等，都有这个烙印，它

们既是学校，又是革命团体，虽然有些是1930年以后办的。在1931年~1946年，他就是以政治为中心把教育和政治结合起来，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决定教育方向，如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等口号的提出。他自己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民主运动上了。这三个阶段，一次比一次进步，他早就走出了教育救国的道路，进而走上革命救国的道路了。从办晓庄起，教育救国这顶帽子就甩到一边了。不加分析地总把这顶帽子一直戴在他头上是不公平的。

4、通过教育工作从事救国事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以教师为职业掩护地下革命斗争，二是为救国事业直接培养人材。这两种情况都应该看到它的历史功绩。陶行知为革命斗争培养人才的作用不可低估。我们反对的只是用教育救国来掩盖政治斗争，排斥革命师生参加政治斗争，象胡适那样。这种情况应前面两种情况加以区别。

5、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生活教育学说。

“生活教育具有教育的作用”是瑞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八十岁（1826年）总结自己教育经验时提出的原则。他认为要从德育、智育和实际技能的培养方面来考虑这个原则所产生的结果。他所讲的生活并不包括社会，只在于依照自然原则运用符合自然的方法。他的生活是“以儿童的倾向、需要和天然的爱好的基础的一系列相互联系，是审慎地顺序排列的练习的结果。”（参阅《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163~211页）

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在1897年的一个纲领性著作《我们的教育信条》中就提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这个学说改变了教育与社会相分离的状况，无疑是对旧教育思想的一大变革，是对裴斯泰洛齐学说的一大进步。当然它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决定了后来它对社会与教育带来的不良影响。杜威的教育就是指学校教育，就是指社会对

学校的影响，“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因而他所说的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都是以保存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参阅《杜威教育论著选》第1~12页）

早在1918年，陶行知就提出了与裴斯泰洛齐、杜威相类似的观点：“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78页）这篇文章原系江苏县视讲学习会讲稿，刊登在1918年7月《安徽教育》第7期和1919年1月15日《教育与职业》第1卷第3期上。这篇文章的思想可能早在留学美国的时候就酝酿，1917年就写成了。据《黄炎培年谱》第35页记载：1916年（民国5年、丙辰）12月5日“安徽陶文浚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科，因应考博士，命题涉及中国教育，属搜集资料，乃复书云‘……国内青年，学成无用，中学毕业生就业者仅十之一，此为国内最急要之问题。解决方法，一在提倡职业教育；一在使普通教育方法之教材和训练方针，皆能切合于实用。’”在《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292页及623页中，陶行知两次谈到：“生活教育之定义在晓庄前九年。”这个时间与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相吻合，其中内容除以上引述外，其余都是1921年暑假演讲的内容。在那篇演讲中他用英文讲了生活教育的定义。用他自己后来的翻译，生活教育包括三部分：一是生活的教育；二是为生活而教育；三是为生活的提高、进步而教育。1927年更进一步定义成为：（一）人民的教育；（二）人民教育人民；（三）人民为自己生活的提高、进步所希求的教育三项。开始，他和裴斯泰洛齐、杜威的观点是一致的，到1921年，就和他们不一样了。一是打破了教育的学校局限性，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这是大教育观的教育概念。二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待社会改革，而不是象杜威那样维护资本主义社会。陶行知在教育上的人民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是与他追求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相适应的。

1926年陶行知为乡村教育研究会制定了《我们的信条》的誓词。这是生活教育的一个纲领性文献，这是1927年生活教育运动开始试验的内容。陶行知说：“当初，生活教育戴着一顶‘教育即生活’的帽子。自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试行了以后，渐渐的觉得‘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行不通了。”这就是说，1918年陶行知开始提出“生活教育”的时候，还有杜威的影响。1921年，在教育目的上，两个人就大不相同了。1926年，陶行知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对教学做合一的原理作有系统的叙述。这个时候杜威的那一套行不通了，杜威对教育方法上的影响也逐渐消除了，于是才进而提出了生活教育运动的纲领。

生活教育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新生事物，开始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为中国教育寻觅的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的生路。这是他从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向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第二个突出的标志。

三、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一个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这个运动以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而著称。陶行知也是把民主与科学贯注在他的政治和教育的全部活动之中。

新文化运动伴随着新教育运动，平民教育是五四运动以来最重要的教育思潮。陶行知开始从事改革教育时，就全力投入到平民教育运动之中。“平民”原语为德谟克拉西，即“德先生”，就是民主的意思。“平民教育”原语为民主和教育或民主主义的教育。平民教育是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平民教育的最初含义是从人权问题开始，就是要尊重平民受教育的权利，其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陶行知在我们介绍的这篇文章中讲的平民主义的教育就是包括全部教育在内的，包括大中小学教育在内的。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最早的成人教育了，就是普及教

育，就是扫除文盲了。平民教育就是解决平民读书的意思。1922年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时，一面介绍西方教育学说，一面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他说“平民教育的目的，是要叫十二岁以上的人，个个读书做好国民”。1923年他和朱其慧、朱经农等人负责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时，建议聘晏阳初为总干事。为什么要聘晏阳初呢？他说：“当欧战期中，有许多华工在法国，多半都是目不识丁者，生活上当然感受种种困苦。幸当时留美学生，曾注意及此，特推晏阳初先生等赴法，专为华工办平民夜校，以补救之。他回国参加青年会的平民教育工作，并在长沙、烟台、嘉兴三处试验卓有成效。”（《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432页、443页）陶行知自己在家里创设平民读书，处并到处推广用种种识字的人去教种种不识字的人，这是他30年代推广小先生运动的雏形。他在长江流域推广平民教育运动，后来迅速推广到20个省区，受教育的人，已经有40万之多。他们想在10年之内，叫全国处处读书、人人明理。他们用平民教育辅助当时的新文化运动。

当时参与平民教育的人也是十分广泛而复杂的。他们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了不同的教育内容。他们采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有的采用学校教育方法，有的采用露天演讲、出版刊物的方法。在教育与政治的结合上，有的侧重教育，有的侧重政治。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们在政治上的变化也是各不相同的，即使一个人的政治态度，也是不断变化甚至不断反复。但是他们的宗旨都是一样的，都没有超出爱国和民主的范畴。后来，在平民教育的基础上，邓中夏办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毛泽东办自修大学，参加了早期的共产主义活动，办学宗旨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范围。陶行知则愈益注意面向工人与农民，从城市走向乡村。1923年10月，他就提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

去的运动”(《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50页)自此,开始了他的乡村教育,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这已经具有比较明显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了。1924年5月,恽代英写文章号召“到民间去”,他认为“最好的农村运动,仍是平民教育”。(《恽代英文集》上卷第537页)《周恩来选集》第333页讲: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即指此。晏阳初于1929年在河北定县开始他的更为广泛的乡村建设试验去了。这些变化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是在不同地区、不同对象之间用不同方法进行同一的平民教育。

在爱国和民主范围内的平民教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它只是一个阶段,至于以后在政治上或教育上发生的变化,已经不是平民教育的范围,因而不能作为判定平民教育的是非标准。由于平民教育的内容停留在扫盲的水平上,人们的世界观对教育内容所引起的影响和变化,还不足以说明平民教育运动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

陶行知在他的教育活动中十分关注科学。他说:“旧文明与新文明之区别,即在科学。”他把教育当作一门专门科学,提倡“实事求是、详加审谛”,普及科学方法,开展教育研究,他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的头脑。他认为“中学课程对于科学,尤宜格外之注重”。(《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230页、第76页)他特别强调一切经过试验。他说:“教育岂能救国乎?吾敢断言曰: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试验者,自设景况,产生结果,以为学理之左证也。”“徒事思想而无试验,则蹈于空虚;徒知应用而无试验,则封于故步,皆不足以尽智育之能事也。”怎样试验?他认为一要“知其要”,二要“有其才”,三要“百折不回之气概”。建设试验的教育,约有四种主要办法:设立试验学校,应用设计法,注意试验的教学法和心理学。(《陶行

知全集》第一卷第62页、第67页、第70页、第110页)1923年他写的《教育与科学方法》的专文,对教育科学的步骤、内容和要求都有极为详尽的说明。他在研究方法上特别强调第一是统计法,第二就是测验,而且两者互相为用。他不仅教授这两门课程,而且身体力行,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现状,与薛鸿志合写《中国之教育统计》;制定了24种测验。这是中国最早的统计和测验。他提倡地方教育行政人员的学业要有大学毕业同等程度,要学习“科学精神与方法”、“科学管理”等课程。陶行知在60多年以前的这些主张,仍然切合当今时宜,仍然是办教育的亟需。陶行知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终生不懈,这正是他由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向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第三个突出的标志。

四、他的生活教育运动最善于把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融为一体。1917年他开始揭露旧教育之弊端,特别指出沿袭陈法和仪型他国这两条的危害。他提倡平民主义的教育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他传播西方教育学说,又特别注意研究中国实际。他多次批评学习西方,学得三不象,弄得自己无所适从,这不是健全的趋向。他对传统教育和西方的学说,采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的实事求是态度,不管是什么都要做到“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91页)1926年他讲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常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同时我们又认定这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他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教育的趋势,而随伴着竞进。”(同上第568页)他提出新教育要“自新”、“常新”、“全新”。这个“新”,就是顺应时代和世界教育的趋势;他又提出办教育要“自主”、“自立”和“自动”,这个

“自”，就把个体、群体、民族、国家的主体精神包括进去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坚持了这个观点的结果。生活教育运动具有中国化和现代化这两个特点。他反对上了脚镣手铐的传统教育，但并没有蔑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他反对盲目崇拜外国文化，但并没有排斥西方文化。无论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他一不赞成照抄照搬，二不赞成一笔抹煞。生活教育从实际出发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这是陶行知由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向激进民主主义者的第四个突出的标志。

一 个 提 案

这是陶行知在1928年5月15日~28日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12个提案之一。这个提案的题目是：请大学院呈请国民政府，划出地方数处献与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理想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后俟试有结果，再行从事推广，以收大同之效案。他在提案中列举了柏拉图、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三位抱有改造社会理想之学者。他说：“柏拉图、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一类人所提倡的学说，虽各有超越的见解，但其中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假使这些人各能得到一个小的地盘，供他实验，则他们的思想，必定可以格外正确；他们的贡献，也必定可以格外丰富。马克思虽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名家，但他所谓之科学，多半是书本的科学，而不是实验的科学。吴稚晖先生说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还要二百年，行无政府主义还要二千年，中国政治是不是这样演进，他老人家这话是否正确，也非实验不可。”（《全国教育会议报告丁编》第36页）

1927年，蒋介石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大屠杀，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而陶行知于此时创办晓庄开始从事他的生活教育运动的试验。他不仅办乡村教育，而且直接从事农民运动，支持国民革命。他勇敢地在国民党的全国教育会上公开提出试验马克思主义的提案，这都充分表现了陶行知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在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的时刻，大胆呼吁：“与其任他秘密进行，防不胜防，不如让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对内对外，应有完全无上的主权。”这个提案当然不会予以通过，大会决议保留。自此以后，陶行知就没有能够再参加国民党官方的任何活动了。1930年4月举行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国民党教育部事先确定请陶行知为师范教育组委员，在报到的时候，却无端撤消其出席权利。晓庄查封，陶行知被通缉，都不能不说是受到这次提案的波及。

陶行知的提案也是十分巧妙的。他列举了三位改造社会的学者，其中三次提到马克思，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两次提到克鲁泡特金，或无政府主义；一次提到柏拉图。他在前一年写的《平等与自由》一文中表明了他不赞成无政府主义。他说：“我们于不知不觉中，都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现在我们要救中国，亟当抑制个人之自由，切不能火上加油的提倡一盘散沙的自由了。”他还特别提出“共产党是与无政府党绝对不同的。”这就说明陶行知的这个提案主要是为了介绍马克思。只有同时列举三个人的名字，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介绍；国民党也难以明目张胆地追究责任了。所以国民党还是不得不签注保留意见，还假惺惺地说什么“不在教育会议范围之内，留供内政部推行自治制之参考”，还不得不让《全国教育会议报告》全文刊载这个提案。他把一切政治经济置于实验范围之中，他说吴稚晖的话是否正确也